



第二册

中国现代文坛选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编

王永生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彭鹤松 黄冬华
封面设计 邹 刚
技术设计 荀新馨

中国现代文论选

第二册

编选者 王永生 沙似鹏 许道明
张 新 胡荣祉 贾鸿猷

主 编 王永生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 5号)

四川宜宾地区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507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

书号 10115·495 定价 2.10 元

《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二册目次

第四辑

小说理论批评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刘半农	(3)
论短篇小说	胡适	(12)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周作人	(24)
论“黑幕”小说	周作人	(28)
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茅盾	(31)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茅盾	(37)
小说的研究	瞿世英	(54)
从神话到神仙传	鲁迅	(68)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鲁迅	(73)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	钱杏邨	(75)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		
——评丁玲的《水》	冯雪峰	(82)
《雨》的序	巴金	(89)
《砂丁》的序	巴金	(92)
关于小说的话	郁达夫	(94)
历史中的小说	吴晗	(97)
小说研究法	张资平	(101)

《新客》及其它	胡 风	(107)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郑伯奇	(113)
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洪 深	(118)
关于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	石凌鹤	(127)
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	张恨水	(132)
典型人物的描写	徐懋庸	(136)
评路翎的短篇小说	胡 绳	(140)
也算经验	赵树理	(157)

第五辑

电影文学论评

影戏脚本取舍之标准	洪 深	(163)
谈谈洪深先生的编剧手段	宋痴萍	(165)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	鲁 迅	(168)
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	田 汉	(174)
《人道》休矣	董 瑞	(178)
《生路》详评	洪 深 郑伯奇	(184)
《狂流》的评价	郑伯奇	(191)
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钱杏邨	(195)
电影罪言		
——变相的电影时评	郑伯奇	(204)
中国电影之路	尘 无	(210)
如何走上前进之路	郑正秋	(224)
传声筒里	张石川	(229)
今后的批判是“建设的”		
——我们的陈诉	洪深等	(234)

电影的教训	鲁 迅	(237)
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电影	洪 深	(240)
电影批评的基准	尘 无	(248)
软性的硬论	夏 衍	(250)
关于文艺影片		
——为电影《唐吉诃德》敬质布拉斯先生	唐 纳	(253)
怎样看电影	石凌鹤	(257)
《新女性》论	石凌鹤	(262)
当今电影批评检讨	穆时英	(270)
软性电影是鸦片烟和红丸	鲁 思	(273)
新的阵容 新的希望		
——勉明星影片公司	宋之的	(275)
作品与生意眼	欧阳予倩	(282)
请电影作家“走出象牙之塔”	鲁 思	(285)
制作家与影评人有联合的必要吗?	赵铭彝	(287)
论国防电影的题材和制作	刘 群	(291)
会客室中	蔡楚生	(297)
中国电影的新路向		
——观《一江春水向东流》、《忆江南》、《松花江上》后	以 群	(307)
略论国统区三年来的电影运动	阳翰笙	(315)
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	袁牧之	(320)

第六辑

创作经验论述

《呐喊》自序	鲁 迅	(331)
--------	-----	-------

我和诗	宗白华	(337)
《雨天的书》自序二	周作人	(345)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冰 心	(348)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郁达夫	(351)
《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	(357)
从《故乡》到《一坛酒》	许钦文	(36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 迅	(368)
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	叶圣陶	(372)
我的创作生活	丁 玲	(375)
创作经验谈	田 汉	(380)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		
——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	穆木天	(385)
《半农杂文》自序	刘半农	(398)
我怎样写《清明时节》	张天翼	(405)
《爱情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给刘西渭先生	巴 金	(414)
诗作谈	郭沫若	(427)
《日出》跋	曹 禹	(438)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	(453)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茅 盾	(458)
为了胜利		
——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	艾 青	(463)
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		
——《流血纪念章》序	欧阳山	(471)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老 舍	(478)
《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	贺敬之	(484)
为《升官图》演出作	陈白尘	(494)

第七辑

国外文论评介

- | | | |
|-----------------------------|-----|-------|
|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 李大钊 | (499) |
| 托尔斯泰的艺术观 | 张闻天 | (507) |
| 泰戈尔的艺术观 | 郑振铎 | (538) |
| 《苦闷的象征》引言 | 鲁 迅 | (544) |
|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 | 梁实秋 | (547) |
| 康德之美学思想 | 吕 澈 | (559) |
| 《艺术论》译本序 | 鲁 迅 | (564) |
|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 | 瞿秋白 | (575) |
| 哲学与艺术 | | |
| ——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 | 宗白华 | (591) |
| 泰纳的艺术哲学 | 韩侍桁 | (601) |
| 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 | 马宗融 | (611) |
| 纪念别林斯基的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 | 周 扬 | (626) |
| 艺术与人生 | | |
|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
的关系》 | 周 扬 | (631) |
| 欧洲文学批评史的鸟瞰 | 朱光潜 | (637) |
| 新现实主义 | 徐懋庸 | (640) |

第四辑

小说理论批评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刘半农

……本文所讨论的，是上中下三等社会共有的小说，并不是哲学家、科学家交换思想意志的小说，更不是文人学士发牢骚卖本领的小说。若要在中国旧小说中举几个例出来：则《今古奇观》、《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都是通俗小说；《燕山外史》、《花月痕》、《聊斋志异》等，都是“发牢骚卖本领”的小说；——此等小说，实在并无本领可卖，不过作小说者，有卖本领之心理而已，——若问“交换思想意志”的小说，中国有了几种？我却回答不出！勉强说几种拉拉场面，也不过《水浒》、《红楼》、《西游》诸书。然此是题外事，不必说它。

题中“教训”二字，是说此项小说出版后，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如何。所谓“积极教训”，便是纪述善事，描摹善人，使世人生羡慕心，摹仿心；“消极教训”，便是纪述恶事，描摹恶人，使世人生痛恨心，革除心。这两种教训，各有各的好处：第一种是合乎“见贤思齐”、“当仁不让”的道理；第二种也合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道理。粗粗一看，决难判别孰好孰坏。然就个人观察所及，则以为——

一、作通俗小说，与其用消极的教训，不如用积极的教训；

二.如其不能，则与其漫骂，不如婉讽；与其从正面直写其恶，不如从侧面曲绘其愚；

三.否则混善恶而一之，用诙谐之笔，以促阅者自己之辨别与觉悟。

要说这三句话，应先问一问做小说的人，对于所做的小说，是否承担责任？中国从前的小说家，心目中本无责任二字，故不问诲淫诲盗，只须心中想得着，笔下写得出，无不淋漓尽致地做到书上去。

他们心中，亦未尝不知淫盗之不当诲，故全书结束，必有一番因果报应的话：——说什么某善人是升官发财，妻妾荣封；某恶人是家破人亡，妻儿流散。——似乎要借此一笔，把全书事实，完全打消，其意若曰：我本来是要教诸位做好人的，诸位自己要做坏人，干我什么事？

此等不负责任的“造孽家”，都已做了过去的人物；虽然遗留许多坏书在社会上，到将来良好的小说发达了，终有渐渐消灭的希望。至于当代的小说家，都已挂了“改良社会”、“启发民智”、“辅助教育”的招牌了；究竟他们能否“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然是个疑问；我辈“以君子之心度人”，却总该承认他们是名实相符的。万一名实竟不相符，还当宽一步说：那是他们头脑欠清，未曾摸着路头，或路头虽已摸着，却嫌能力不足，未能实事求是做去。若说现在的世界上，竟还有不负责任，居心要制造恶人，酿成恶社会的小说家，我怕这话未免有些太“挖苦”了吧！

今先为“头脑欠清，未曾摸着路头”者说几点：

我尝说，“世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可怜的，一种是可恨的”。为什么没有可敬可爱的呢？因为一个人有了可敬可爱的资格，便天然要陷入可怜的地位。换一句话说，这一个世界，在未达我们理想中的“标准文明时代”之前，永远是个恶人欺侮善

人的时代。做小说的把恶人描画出来，其本意无非说“世界上有这一等人，诸位要好好防备，可不要落在他坑里”，或是说“诸位请看，这等人做了坏事，到临终没有好结果，诸位可不要学他”；或是说“这等人太恶了，我现在揭穿了他的黑幕，大家合力反抗吧”。这三种用意，都从“悲天悯人”的念头转化出来，从正面看去，简直半点毛病没有，若从反面仔细推测，便有种种流弊：

第一，人类的摹仿性，是最丰富的。辨别善恶，也是人人都有的：恶人亦能辨别善恶。故照常理说来，把辨别善恶性加到摹仿性上面去，当然是人人都想做善人，人人都已做成了善人。然而情理与事实，相去不可以道理计，是什么缘故呢？这就叫做“理不胜欲”。譬如一部《聊斋志异》，把狐鬼两物，可算形容得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了？然而我在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看了它，心中明知狐鬼之可怕，却存了个怪想，以为照蒲留仙说，天下狐鬼，多至不可胜计，且都是凿凿有据的，为什么我家屋子里，不也走出几个仙狐艳鬼来同我玩玩呢！这虽然是极可笑的孩子思想，却由此类推，我可断定看《官场现形记》的，看的时候虽觉书中人卑鄙无耻，到了身入官场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要做起书中人来；那看《儒林外史》的，看的时候虽替书中人一阵阵的肉麻，一把把的捏汗，到了地位相同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地如法炮制，做起假名士来。照此说，不是做消极小说的人，没有在反动一方面收到什么功效，反实施了一番做恶人的直观教育么？

第二，人类的神经，只能施以适当之刺激，不能施以过分之刺激；若刺激过了分，则神经渐趋衰钝，终至于麻木不仁而后已。故外国戏馆中，每遇谋杀决斗战争诸事，往往不在戏台上直演其惨状，只在谈话中用悲恻的神情表白出来，即病死之情状，亦鲜有明演者；又国家对于罪犯，非至万不得已不判死刑，即使判

了，亦都在隐僻之处执行；甚至灾害时疫，及一切惨怖事实，不能在贵客及妇女之前谈论。这些事，粗看了似乎无甚道理，仔细想去，当见其用意极深。中国却不然，种种奸淫惨杀之事，尽可在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阔论；官厅里杀起人来，必守着“刑人于市，与众共之”的古训；戏子们更荒谬，“三更三点的见鬼”，“午时三刻的杀人”，几乎无日不有；若演《九更天》里的“滚钉板”，《罗通扫北》里的“盘肠大战”，《大香山》里“刀山地獄”，《蝴蝶梦》里的“大劈棺”，——此是关于惨杀一方面的。其关于淫秽一方的，如《送银灯》、《奇柬》、《拾玉镯》等，每有种种肉麻动作，亦可作如是观，则演的人固然是兴会淋漓，看的人也觉得分外津津有味。从前我在上海，请一位美国朋友看了一次中国戏，那朋友说道：“贵国的戏，若叫敝国女人看了，可吓得她们一礼拜睡不着！”试问外国人看了要睡不着的，中国人看了反觉津津有味，中国人的神经，已到了哪一等地步？又前一礼拜，周启明先生向我说：“近来在《研堂见闻杂记》里，看见一段故事，说‘清初李森先巡按江南，捕优人王子玠，与奸僧三遮和尚，相对枷死。子玠善演红娘，以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试问人家到了将死的地步，中国人全无恻隐之心，反要大开玩笑，此种“忍心害理”的思想，是人类应有的不是？所以我常说，人类的神经，自有上天所赋的一点“真实感觉性”。有此一点“真实感觉性”，加以适当之刺激，人人可以做得圣贤，成得佛；犹如人舌头上，都有辨别五味的功力，不必加以矫揉造作，即能自成其为“知味者”。若神经上多受了过分的刺激，他那现象，便如专吃腥臊油腻的野蛮人类一般，对于通常滋味，反不能辨别。久而久之，自能成为“习于世故”，“愍不畏死”，“哀乐无动于中”的“老奸巨猾”了。

第三，做消极小说，大概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直写实事，或在实事之外，略加点染的；一种是凭空杜撰，完全是著作

家杜造出来的。……这两种，若要从根本上推翻他，简直是贻害社会，比几部有名的诲淫诲盗小说，还要厉害百倍！何以故？因为诲淫的小说，即使大声疾呼，满纸写了“淫”字，遇到“无可与淫”，或意虽欲淫，而没有“潘骥、邓小闲”那种资格的人，还只是淫不起来；那海盗小说，即使写得荒谬到极处，满纸都是刀光血影，遇到“不必为盗”，或“虽欲为盗，而没有做强盗的经济魄力”的人，还只是做不成功强盗。如此说，诲淫诲盗，被诲者不过是一部分人，决不至全世界都变作“男盗女娼”的。

至于前文所述的“现形记”与“黑幕”，却大有普及一切的魔力。因为这一派书，所纪既属事实，故处处与现代社会吻合，摹仿起来很容易；而且范围极广，非但不象淫盗两事之受社会裁制，竟有许多是国法之所不禁的，故看书的人，一到“心中所欲”或“地位所需”的时候，便可采集众长，实行摹仿。

书中事实，本来是一二恶人，费了许多心思才能发明，且未必肯轻易告人的；自从这类“犯罪百科全书”出了世，竟变做了全世界的公器了！侦探小说的用意，自要促进警界的侦探知识；就本义说，这等著作家的思想，虽然陋到极处，却未能算得坏了良心；无如侦探小说要做得好，必须探法神奇；要探法神奇，必须先想出个奇妙的犯罪方法；这种奇妙的犯罪方法一披露，作奸犯科的凶徒们，便多了个“义务顾问”；而警界的侦探知识，却断断不会从书中的奇妙探法上，得到什么进步。……这种书，价值远出于“现形记”、“黑幕”之下，文笔也芜陋异常；然而英美两国，一般无知识的新闻记者和杂志主任，也居然称他为“文豪”咧！

以上都是就理论上说的，若就做法上说，则做积极小说，简直比做消极小说难了百倍。所以往往有头脑极清，明知消极小说之有流弊，动起笔来，却不知不觉地写到消极一条路上去。这是因为——
一. 我们眼光中所看见的社会，好人少，坏人多；要写好人，

简直找不到个影子；要写坏人，却触目皆是。

二.好人是不能单独做的，必须有坏人衬托，把坏人写得愈坏，方见好人之愈好。然而写坏人易，写好人难，即如写个美人，便把《洛神赋》上的词头儿全部搬在纸上，亦觉不甚出色，要写个丑妇，却一动笔，便可引得读者哈哈大笑了。

三.人的性情，是喜谈人短，恶说人长的，譬如三五个朋友聚在一处谈天，若说某甲如何如何好，不上三五句话就说完了；若谈某乙如何如何坏，必有某丙某丁喋喋不休地背出他的历史来。又如写信，要恭维人家几声，便抄遍了什么《尺牍大全》，自己终觉得有些肉麻可笑；若要写封骂人的绝交书，保管文思泉涌，洋洋千百言，不难一挥而就。

四.写好人的文章，已为千百年来一般“谀墓文豪”做尽；我们再去做他，尽管面子上挂了“小说”的招牌，看的人还要当他是什么《哀启祭文家传神道碑墓志铭》咧！

五.专做好人的正面文章，在中文则容易做成《太上宝筏图说》、《阴骘文图说》，在西文则容易做成“*Sunday School Stories*”，“*Church Stories*”把小说做成了这一等书，还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没有？

当初我看小说，不论中文西文，总看不见什么良好的积极小说，心中颇以为怪；后来自己做了几年，领略了些甘苦，才知道内中有这几种原因。

照上文说，做积极小说虽非绝对的不可能，却已证明十分之八九是不容易做好的；要在这不容易之中找些方法出来，大约有五种——

第一种是化消极为积极。如陶渊明做的《桃花源记》，完全是表示厌世思想的。若老陶要把目睹的怪现状写出，至少也总可做成十部八部的“现形记”或“黑幕”；然而他不说世界的黑暗，只说自然界的快乐，又轻描淡写，把“不知有汉，无论魏

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及“不足为外人道也”数语，将本意说出，这便是他极有斟酌处。又如英人笛福所作的《鲁滨逊漂流记》亦与老陶同一用意，后人把他看作惊险故事便错了。

第二种是以积极衬托消极。如苏格兰克罗吉特所做的《司贴克特牧师》说兄弟两人，做兄的尽力种田，把家产变卖了培植兄弟；到他兄弟做了医学博士，竟把老兄置之不问了。此种材料，若叫中国人来做小说，必把乃弟描摹得不堪言状，末了再加上个“人之无良，一至于此”的批语；克罗吉特却只写乃兄的如何劳苦，身体如何衰弱，心地如何忠厚；其“画龙点睛”处，仅有“乃兄耕田疲乏时，引领遥望，见乃弟骑马，挥鞭由阡陌间驰过”一语。又英人埃拉·希金森所作的《理斯勒夫人的圣诞午餐》本来说一个不孝的女儿的，然而他不说女儿的如何如何不孝，却把母亲的如何衰老，如何孤苦，如何牵记女儿，描摹得委婉动人，呼之欲出。结尾说母亲有了如此好心，女儿竟不回来。是一篇文章，完全翻了个身，句句不骂女儿，却句句骂在女儿身上了。此等反衬文笔，感人最深，又全无流弊，做通俗小说，最宜取法。

第三种是以消极打消极。如俄人列夫·托尔斯泰所作的《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是用滑稽笔法，以反面的消极，打消正面的消极，促动大地主的反省，正合《代数学》中“负与负乘，所得为正”的一句话。此种方法，当描摹正面的消极时，最宜自有分寸；否则“现形记”、“黑幕”诸书，末段何尝不有一番自己打消自己的话说呢。

第四种是以积极打消消极。如英人狄更斯所作的《圣诞节颂歌》头段数页是正面的消极，初入梦的一小部分是反面的消极，后来一大部分，由消极趋于积极。

第五种是消极循环打消。如吴稚晖先生所译的法国剧本《鸣

不平》，或作《社会阶级》，其原本余未能见，是用“黄雀螳螂”的办法，把“公爵”、“银行主人”、“书记”、“婢女”、“车夫”、“黑奴”、“乞丐”、“狗”八种阶级，正面反面，各各写了个照，随即各自打消。这种方法极好，然当变换文章结构，方可引人入胜。要是死守了这一种章法，便“味同嚼蜡”了。

做小说的方法，本来是千变万化，不能拘执一格的，上面所说的五种，不过略笔其例罢了。

袁子才诗话里，说“老学究论诗，必有一副门面语。……必曰须有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之美恶。《三百篇》中，……有含蓄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是也；有说尽者，‘投畀豺虎，投畀有昊’是也。”

这一番话，拿来议论小说，本来是恰切不移的。试看世界各国的近世小说家，凡是有魄力、有主张的，人人都有一部两部反抗强权，刺激社会的小说；非但不说那“须有含蓄”的腐败话，便连积极消极，也不成问题。然就小说的全体说是如此，若只就通俗小说一部分说，究竟要有些斟酌。所以我今天所说的话，自己也知道意思很肤浅，且大有老学究气息，然为目前时势之所需要，不得不如此说。到将来人类的知识进步，人人可以看得陈义高尚的小说，则通俗小说自然消灭了，我这点也就半钱不值了。

本文是刘半农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载于同年七月刊行的《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十号。署名刘复。

刘半农所说的“积极”与“消极”，乃指小说描写的对象是“善事善人”，还是“恶事恶人”；和今天所说的“歌颂与暴露”有相似之处。“教训”是指小说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颇同今日所说的“社会效果”。刘半农从多方面论述小说应给人们以